

◀ (上接14版)

尔的言辞，徐志摩的诗人气质和翻译，成为中英双语最美修辞的双壁，让清华师生大饱眼福和耳福。

我的年轻的朋友，我眼看着你们年轻的面目，闪烁着聪明与诚恳的志趣，但是我们的中间却是隔着年岁的距离。我已经到了黄昏的海边，你们远远地站在那日出的家乡。

我的心伸展到你们的心，你们有我的祝福。我羡慕你们。我做小孩的时候，那时仿佛是东方不曾露白。宇宙暗森森的，我们不曾充分的明白我们自己已经出世在一个伟大的时期里。

那时期的意义与消息已经显露在今朝。

我相信现在在世界上有的是人们，他们已经听着这时期的感召。

你们正可以自负，同时也应得知道你们的责任，如今你们生长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期里。我们从我们的苦恼与痛楚的火焰里隐隐的辨认出这时代的伟大，这苦痛是普遍的，我们还不十分知道前途是何等的光景。

诗一般的语句，从长髯白发的诗人口中缓缓流淌而出，听者莫不沉浸其中。

泰戈尔号召青年们拿出自己的光亮，去“参加世界文化的展览”。他说自己不相信一些人的说法，认为中国人都是实利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他不相信“任何的民族同时可以伟大而是物质主义的……我以为凡是亚洲的民族决不会完全受物质主义的支配”；“人类的文明正等着一个伟大的圆满，等着他的灵魂的纯美的表现。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应得在这个方向里尽你们的贡献”。他劝告青年们要坚持生活的美的原则，不要被物质主义的毒素玷污了自己本来纯洁的灵魂，“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诗人满怀深情地说：

我是倦了，我年纪也大了。我也许再不能会见你们了。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集会。

因此我竭我的至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诞妄的巨体的叫唤，拥挤的时尚与无意识，无目的的营利的诱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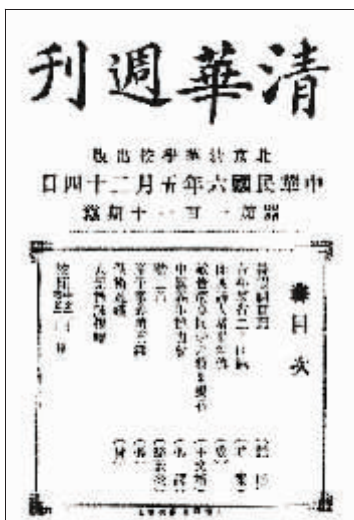
保持那凡事必求完美的理想。你们一切的工作，一切的行动都应得折中于那唯一的标准。

如此你们虽则眷爱地上实

体的事物，你们的精神还是无伤的，你们的使命是在拿天堂来给人间，拿灵魂来给一切的事物（泰戈尔：《清华演讲》之徐志摩附述）。

泰戈尔的演讲是即兴的，但他的内心就好像有始终畅流不息的泉水，只要有一个出口，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所以他的演讲就像是在把一棵小树苗在听众面前慢慢催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那样神秘，而听众也就在他变魔术一样的语言的急流中沉醉于这棵大树的绿荫的阴凉，忘记了自己周围喧闹的世界。实际上，他的很多作品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他不是像一些作家那样在开始创作之前都有很详细的规划，至少要打好腹稿，而是至多抓住一点点灵魂的火花，或心灵里一朵云彩飘过时投下的阴影，他就可以用诗神给他的“灵感”，变魔术般变出一首小诗或一段故事或一出戏剧。担任他的翻译的徐志摩有一次奇怪地问他：“你这样永远受创作的冲动的驱使究竟是苦还是乐？”听徐志摩这样问，老诗人笑着反问道：“你去问那夜莺，他呕尽他的心血还要唱，他究竟是苦还是乐？你再去问问那深山的瀑布，他终年把他洁白的身体向深谷里摔个粉碎，他究竟是苦还是乐？”（同前）

与以前的演讲相比，泰戈



《清华周刊》第110期
1917年5月24日封面上有
《印度诗人塔果尔传》。

尔在这次演讲中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中国的物质主义进行直接的批评，而是非常婉转地予以讽刺，而且语气里多了一点惆怅、一点无奈、一点欲言又止的伤心。他似乎不再直接指责他在中国所看到的他认为丑恶的东西，虽然他那如炬的目光



《大中华杂志》泰戈尔手札 均资料图片

早就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这种态度与语气的改变，与他听在耳里的一些不和谐的反对的声音有关：这对抱着满腔热情而来的诗人来说，未免让他感到伤心了（同前）。

诗人把“真实”留给了清华

诗圣莅临，清华师生“不独争欲观其风采，且以能与彼接谈为快”。因此，经学校协调，并经泰戈尔许可，5月2日、3日两天下午五时至六点，泰戈尔专门接见学生。一天傍晚，泰戈尔在后工字厅接受了十余位同学的采访。泰戈尔背着栏外的荷花池，同学们则环坐席上。同学们首先询问如何解决西方文明“迫成之饥窘问题”，泰戈尔表示，自己因不熟悉中国的具体情况，所以就只能介绍了西方文明与印度的贫富差别的关系。同学们还问了其他问题，如：“他所信仰的上帝究竟是否与耶稣教的上帝有分别？”“人们的生存在世，是不是特幸？”“‘自由’与‘爱’之确凿的界说及其相互的关系”……“太氏温蔼可亲，且善为青年劝导。是以聆其谈话者莫不叹佩。”（《哲人谈话》，《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不知不觉，已是6点半，比约定的时间多了半小时，同学们恐老诗人太辛苦，遂道谢告别而去。

5月2日，有“中国的泰戈尔”之称的辜鸿铭，专程从北大赶到清华会见泰戈尔。两人具体谈了什么，不得详知，但辜鸿铭对泰戈尔并无好感。3日，清华学生梁朝威采访辜鸿铭，请他谈谈对泰戈尔的认识，辜鸿铭认为泰戈尔足以代表印度文化，“然其知中国之

事少，且所言不足以救中国之弊；盖其理想太高，太谷尔其犹龙乎！”辜鸿铭将泰戈尔比作中国的老子，并且感叹说“堂堂乎太谷尔也”（梁朝威：《与“中国的太谷尔”谈话记》，《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此时的辜鸿铭谈及泰戈尔还算客气，同年7月24日，他在法国《辩论报》上撰文，则直接称泰戈尔给中国带来的只是“谬误和混乱”，“让他不要来给我们讲授什么文明”。

3日晚，学生会开全体学生大会欢迎泰戈尔。这次欢迎会原定10日举行，因为泰戈尔原定在清华园驻留23天（4月28日至5月20日），但因泰戈尔“不日离校，恐不克亲受欢迎”，所以才提前至3日（泰戈尔在清华园的实际停留时间为6夜5天）。

晚餐时分，清华附属高中的同学皆在清华大学聚餐，饭前高唱中英文校歌，“精神为之大壮”。饭毕，同赴新礼堂静候泰戈尔莅临。不久，“吾人望眼欲穿之诗哲由工字厅从容来矣”。全体同学起立致敬。泰戈尔落座后，首先由学生会干事部主席致开会辞。辞毕，同学们同唱校歌。歌毕，冀朝鼎代表全体同学致欢迎辞，“辞中意气壮巍，道东方之文献；情意虔恳，言欢迎之热诚，为该会之最精彩者”。会上，同学们还表演了两出哑剧、国乐、昆腔等节目，“皆极一时之盛”。泰戈尔对国乐表现出浓厚兴趣，一曲完毕后，意犹未尽，请同学们再弹奏一曲（《欢迎太戈尔》，《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

他觉得中国的学生很聪明，自己与学生们很“投机”。徐志摩注意到了诗人情绪的变化：“听老人的口气，似乎他自以为与学生们的谈话是很投机的。”他遗憾自己当时都不在场，也不知道这些珍贵的谈话是否有人记录下来：“那几番谈话不知道当时或是事后有人记于否（恩厚之只剪着几条断片，却始终不曾整理出来），如其有，我盼望记下的诸君将来有机会发表。”不知他后来是否知道，这些谈话的大致内容发表在《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上了。

泰戈尔在清华期间，正值“燕草碧绿，秦桑绿枝时节，水木清华的清华园已成了姹紫嫣红，鸟语花香的乐园”，泰戈尔此时“‘驻锡’于此”，与清华美景“互相辉映，点缀一时，水木清华的清华园，益呈霭祥可爱之象”。清华师生“居此霭祥可爱之乐国，得聆此诗哲环琦之高论，不禁心旷神怡，觉天下事无事不乐，天下物无物不美矣”（梁朝威：《与“中国太谷尔”谈话记》）。

5月5日，泰戈尔告别清华师生，返回北京城里，出席下午1点至5点在东城大佛寺举行的佛教会欢迎会。清华师生恋恋不舍。因为泰戈尔在清华的一星期，“实在是我们最引以为荣幸，并且在清华的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虽然以前清华来过很多达官贵人，但热闹过后，他们什么都没给清华留下；但泰戈尔不同，他来清华，是“带了一份极珍贵的礼物来送给我们享用。这份极宝贵的礼物就是他那伟大的人格”。所以，他“离开了清华之后，他的印象是曾常时存留在我们的脑筋里。他对于我们的行动和思想是有很大的影响。他曾使得我们此次欢迎他的兴趣不但不渐渐消灭，并且引导我们到了一条新辟的大路上，使得我们心头时时刻刻地记着他的话，向前进行”。这条大路，就是“建设世界文化的使命”（《泰戈尔先生去后》，《清华周刊》，第313期，1924年5月9日）。

泰戈尔的美好形象，就这样永远留在了清华师生脑中。而清华师生的真诚，也给老诗人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清华精神与老诗人的灵魂在交融中诞生了著名的“清华演讲”，至今都仍在激励着清华人去直面真实、直面责任，为自己、为清华、为中国、为世界，去担当。

（作者为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